

# 从大同善化寺到杭州智果寺

——以朱弁的遗迹为中心

邢 东 风

山西大同，古名平城、云中，曾是北魏的国都、辽金的西京；浙江杭州，古名临安，曾为南宋的国都。当金灭北宋、南宋初期，有一位苏武式的英雄，那就是自南宋出使金国的朱弁。在大同和杭州，都曾留下朱弁的遗迹，它们是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宝贵遗产。但是关于这些遗迹、朱弁本人的情况、以及相关的史实，历来缺少专门性的研究。本文根据遗迹调查和史料记载，就朱弁的生平事迹、他与佛教的关系、以及与他生前身后相关的史实进行考察，为的是揭示大同和杭州的历史上与朱弁相关的一个侧面。

## 一、朱弁碑里话当年

### 1、善化寺与朱弁碑

在大同及其周边，至今保存有许多辽金时期的佛教遗迹，善化寺就是其中之一。善化寺始建于唐，历史上先后名为开元寺、普恩寺，明代正统十年（1445年）改为今名，因位于大同市内小南街附近、原大同城南门内侧，当地俗称南寺。善化寺是迄今保存大体完整、规模宏大的辽金佛教寺院，内有辽金时代的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普贤阁，以及华严三圣像、五方佛像、二十四护法诸天像等，还有明代的建筑、四天王像、扁额等，因此这里不仅是辽金建筑的珍贵遗存，而且是辽金佛教文化的综合宝库。

善化寺的精彩除了建筑和造像以外，还有朱弁撰写的碑碣，那就是《大金

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文由朱弁作于金皇统三年（1143），大定十六年（1176）立碑，当地俗称“金碑”或“朱弁碑”，在善化寺保存的碑碣中刻立最早，碑文所记又是后来有关善化寺历史记载的张本，因此最有价值。这篇碑文通常不易见到，这里不妨全文照录（文中标点系笔者所加，“/”号表示另起一行）：

###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

诸佛菩萨之应世也，亦犹哲王之揀弊，或忠，或质，或文，虽制治不同，其趋一也。世人循达磨对萧梁氏之言，遂疑有为功德，不可复作，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补理故寺，当获二梵之报者。释迦遗训，具存贝典，则崇饰塔庙，兴建寺宇，以示现佛菩萨境界，盖将诱接/众生，同归于善，其为功德，讵可测量哉？彼达磨大士，方以妙元明心，亲提教外别传之印，则于有为功德，不无抑扬，是亦因时揀弊耳，非/反贬也。具愿力苾芻，能克遵付属，而成就兹事，其为功德，尚何啻耶？/

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号为大兰若。辽末以来，再罹锋焮，楼阁飞为埃垆，堂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骄兵悍卒，指为/列屯，而喧寂顿殊，掠臧俘获，纷然错处，而垢净俄变。残僧去之而饮泣，遗黎过之而增歎。阅历滋久，散亡稍还，于是寺之上首通玄文慧/大师圆满者，思童戏于画沙，感宿因于移础，发勇猛心，得不退转，舍衣孟凡二十万，与其徒合谋协力，化所难化，悟所未悟，开尸罗之坛，/阐庐舍之教，以慈为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为门，咸怀后至之耻。于斯时也，人以须达自期，家用给孤相勉，咸蕴至愿，争舍所爱。彼髓脑/支体尚无所吝，况百骸外物哉？于是攀市委珠金、脱袍鬻裘裳者，相系于道。累月逾时，殆无虚日。经始于天会之戊申，落成于皇统之癸/亥。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瓴甃变于埏埴，丹雘供其绘画，椽椽梁柱，饰而不侈，/阶序牖闼，广而有容。为诸佛萨埵，而天龙八部，合爪掌围绕，皆选于名笔；为五百尊者，而侍卫供献，各有仪物，皆塑于善工。腴容庄穆，梵/相奇古，慈悯利生之意，若发于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于舌端。有来瞻仰，莫不钦肃，五体投地，一心同声，视此幻身，如在龙华会上百/宝光明中，其为饶益，

至矣大矣，不可得而思议矣。圆满今年七十有四，自惟 君恩佛恩，等无差别，成此功德，志实有在，非独为前途 / 津梁也。然此功德，为于治安无事之时，则其成也甚易，图于干戈未戢之际，则其成也实难。圆满身更兵火，备历鞫勤，视己财货，犹身外 / 影，既捐所蓄，又哀檀信，经营始终，淹贯时序，皆予所目睹也。则其成就，岂得以治安无事时比哉？始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戌冬十月，乃 / 迁于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众以满之意状其事，以记为请，记事之成，要得其实。今予既身亲见之，其可辞哉？ / 按寺建于唐明皇时，与道观皆赐开元之号，而寺独易名，不见其所自。今楼有铜钟，其上款识乃是清泰三年岁在丙申所铸造也。其易 / 今名，当在石晋之初，或唐亡以后，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耳。后之作者，见其阙文，悦得其本末，为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众之 / 所欲闻也。皇统三年二月丁卯，江东朱弁记。 /

少中大夫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上轻车都尉济阳郡  
开国伯食邑

七百户赐紫金鱼袋丁 暉仁篆额 /

中宪大夫西京路都转运副使上骑都尉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  
鱼袋孔固书 /

通玄文慧大师赐紫沙门 圆满 提点 /

大定十六年丙申八月丁酉初一日癸酉三纲寺主沙门 惠躅尚座

行完都维那栖霞 立石 雁门解遵一刊 / <sup>1)</sup>

朱弁碑记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说明“补理故寺”在佛法上的根据。针对否认“有为功德”的观点，强调“崇饰塔庙，兴建寺宇”不仅可以积累福报，而且可以显示诸佛菩萨境界，引导众生同归于善，因此功德无量。第二，说明普恩寺（善化寺）被破坏的状况以及修复的经过。辽末以来，该寺屡遭战火，饱受摧残，军队入驻，寺僧离散；荒废之后，圆满大师与徒众发心修复；他们以戒律严整和慈信精神感召人心，得到信众的协力和捐助，最终成就修复事业。第三，描写修复后的普恩寺。修复后的普恩寺有大雄宝殿等殿堂阁宇共80余间，装饰精美而不浮华，阶梯门窗宽广开阔，绘画塑像出自名家手笔，佛像神态庄严慈

祥，生动感人。第四，称赞圆满大师的功德。为修复古寺，圆满大师不仅倾其所有，而且历尽艰辛坚持不懈，“经营终始，淹贯时序”，不图个人前途利益，只为报答君恩佛恩。作者感慨说，成就此等功德在和平时期已属不易，在战乱时期更是难能可贵。第五，回顾作者与寺僧交往的经过，并追溯该寺的历史。作者朱弁自天会八年（1130）移住寺内，与寺众往来凡14年，亲眼目睹修复过程，于是写下这篇碑记；作者根据当时寺内尚存的清泰三年（936）所造铜钟上的文字，推测寺名改于五代后晋初期，期待后人弄清改名的原因。

除了上述内容以外，前人曾指出碑记中别有“志意所在”。不过那是言外之意，不是碑记的直接话题，且待下文另说。

## 2、朱弁碑的人和事

关于普恩寺“辽末以来，再罹锋烬”之事，虽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但参照辽末金初的史实，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背景。公元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之后连年对辽作战，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仅10余年之间，不仅淹有辽国之地，而且攻占开封，灭掉北宋。普恩寺遭到战火破坏，就在金兵追击辽末天祚帝和攻取西京大同期间。据《辽史》记载，辽天祚帝于天庆九年（1119）9月和次年冬两次到过西京大同<sup>2)</sup>。保大二年（1122）正月，天祚帝被金兵追击至云中（今大同）；至保大四年（1124）4月，“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sup>3)</sup>。又据《金史》记载，金天辅六年（1122）3月，天祚帝被金兵追至西京，西京投降；不久西京复叛，金兵于4月再取西京<sup>4)</sup>。根据这些记载，不难想见金兵当时攻势迅猛，而辽军也曾极力抵抗，于是大同成为辽金两军激烈争夺之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普恩寺便难逃池鱼之殃，从而受到战火摧残。根据碑文“再罹锋烬”的提法，恐怕普恩寺当初不止一次遭难，所以破坏的程度也很严重。更有甚者，骄兵悍将进驻寺内，致使清静的寺院变得乱哄哄，僧人被迫离散。碑文虽未明言入驻者系何方军队，但是从金兵最终占领大同的结局来看，很可能就是金兵。

普恩寺的修复始于金天会六年（1128），完成于皇统三年（1143），竣工时间与碑文的写作刚好同年。修复工程历15载，可见进展艰难。工程的发起人和主

持者为圆满大师。当朱弁写作这篇碑记时，圆满74岁，然则当其发起修复工程时，已是60岁的老人。关于圆满的生平事迹，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幸亏有朱弁碑的保存，后人才得以知道大同善化寺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位功德无量的高僧。

根据朱弁碑的落款部分，可知当时题写碑额的是丁暉仁，书写碑文的是孔固，刻碑人叫解遵一，主持立碑的是普恩寺僧惠躅、行完、栖演等。由于史料有缺，其中大部分人物的情况今已无考，但是关于丁、孔二人，尚可略知消息。

碑额“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12个篆体文字，工整秀丽，出自丁暉仁手笔。碑文落款处，在他的名字之前标有“少中大夫、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上轻车都尉、济阳郡开国伯”等一系列头衔，其中与大同有关的官职为“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由此可知他是当时大同的地方长官。

据《金史》本传，丁暉仁（？～1181），字藏用，大兴府宛平（今北京西部）人。皇统二年（1142）进士，先在武清（今属天津）、磁州（今河北磁县）、和川（今山西安泽）等地任官，大定三年（1163）以后任定武军节度副使，又在各部任职，以后历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刺史、同知西京留守事、陕西西路转运使等职<sup>5)</sup>。史传中没有说明丁氏在大同任职的具体年代，但根据碑文的记载可知，当大定十六年（1176）此碑建立之时，他已在大同任职。

丁暉仁乃好学之士，史传说他“冲淡寡欲，读书之外无他好。辽季避难，虽间关道塗，未尝释卷”。他在各地任职期间，曾多次兴办学校，来到大同以后，“首兴学校，以明养士法”<sup>6)</sup>。恢复文教，创办学校，似乎是他为官生涯中比较突出的业绩，如果再考虑到他为此碑题写碑额的情况，可知他在大同期间不仅兴办过学校，而且参与过佛教复兴的事业。

显然，朱弁碑的建立得到了当时大同地方长官丁暉仁的支持。丁氏此举，大概不单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而且也和社会环境相应。综观他的任官经历，大致相当于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统治期间。金世宗在当时就有“世宗之仁”的美誉，在他当政期间，金国政治比较安定，对外没有大规模战争，因而被史家称为“世宗之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包括佛教在内的文教事业才遇到了恢复的契机。丁氏题写碑额，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一幕。

此碑正文部分由孔固书丹，颜体正楷，苍劲浑雄，极见功力。碑文落款处，在孔固的名字之前标有“中宪大夫、西京路都转运副使、上骑都尉、鲁县开国子”等一系列头衔，其中与大同相关的官职为“西京路都转运副使”，由此可知他当时在大同担任转运副使；此外还可知道他当过骑都尉，封地在鲁县<sup>7)</sup>。那么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

孔固的传记不见于正史，只在其他史料中有零星记录。其中之一是南宋徐梦莘（1125～1205）的记载：“孔固，字德远，孔子四十七代孙，状元王堪榜及第，葛王立，除宣徽少卿。”<sup>8)</sup>这里提到的葛王就是金世宗。世宗原为葛王，大定元年（1161）登基，孔固于是年任职宣徽院。徐著《三朝北盟会编》记录的历史刚好也到这一为止，其中记录的孔固显然活跃于金世宗在位期间，与作者徐梦莘时代相同，朱弁碑的建立（1176年）也在这一期间，因此徐氏所记的孔固与朱弁碑的书写者应为同一人物。

另一条记载见于《山东通志》：“孔固，宁海州人，骑都尉。”<sup>9)</sup>这里提到的孔固为金代人物，而且也是骑都尉，与碑文书写者应系一人。金代海宁州的辖境包括今山东烟台、威海、牟平、文登、荣成、乳山等地，孔固就是这一带出身。不过，《山东通志》为清代编修，不知其所据资料何在。

将以上记载综合起来，可知孔固字德远，孔子第47代孙，宁海州人，进士出身，骑都尉，金世宗时曾在宣徽院任职，当朱弁碑建立前后，他在大同任西京路都转运副使。至于孔固书丹的年代，应在朱弁碑记的立碑（1176年）之前不久，即1170年代前期。

和丁晞仁一样，孔固也是由于在大同任官而得以和善化寺结缘，并为朱弁碑的建立作出贡献。此碑为书法杰作，他的手笔为善化寺和朱弁碑增添了光彩。

## 二、朱弁生平与佛教

### 1、朱弁的生平

说到朱弁其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提到和他相关的一个人物，也许就显得不那么陌生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1130～1200）。

朱弁者，朱熹之叔祖父也。朱熹是朱弁的侄孙，曾经撰写《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sup>10)</sup>，详细记述朱弁的生平，后来《宋史》的朱弁本传就是根据朱熹的记载而作成<sup>11)</sup>。通过朱熹和《宋史》的记载，可以了解朱弁的生平。

朱弁(? ~ 1144<sup>12)</sup>)，字少章，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少时聪慧好学，20岁后入太学，受到太学教授晁说之的赏识。后随晁说之归新郑(今属河南)，娶晁氏侄女为妻。新郑位于开封附近，又离古都洛阳不远，地处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朱弁在这里跟随博学多艺的晁说之游学，见闻日广，陶醉于学问掌故，以至对科举仕进也失去兴趣。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安逸而又惬意的时期。

好景不长，公元1126年12月至次年3月，金兵攻占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当金兵入侵之际，朱弁一家曾到大隗山(今河南新密)避难<sup>13)</sup>，结果还是未能躲过劫难，落得家破人亡。公元1127年5月，宋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南宋建立。此后不久，便往临安(今杭州)迁都，在经过扬州(今属江苏)的路上，急忙召募使者前往金国，名为慰问两宫(指被俘的徽、钦二帝)，实则企图对金求和。当时战事未休，朝中竟无人敢应，朱弁正在南归的路上，闻讯之后自告奋勇前往应募，于是被朝廷派为通问副使。建炎二年(1128)正月，与正使王伦一道出使金国，从此踏上了长达17年的留胡之路。

朱弁入金之后，曾见金相粘罕，申明和解之意，但是不被理睬。后被安置在云中(大同)使馆，表面受到礼遇，实则形同软禁。公元1132年，金人告知可以议和，但只允许一人回朝复命，于是王、朱二人抽签决定去留，朱弁严辞拒绝，毅然决定留下。王伦临走前，朱弁留下使者印信，从此怀抱印信，起卧不离于身。公元1130年，刘豫在金人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权，号称大齐。此后金人胁迫朱弁出任伪齐官职，朱弁严辞拒绝，并痛斥刘豫为“国贼”。金人盛怒，断其食物，朱弁不仅毫不畏惧，而且从屋中反锁自己，“忍饥待尽，誓不为屈”。金人无奈，只得重新以礼相待。此后，金人又要朱弁出任金国官职，朱弁再次拒绝。又上书金国要人，表示任杀任刮，随时听命。此外，金主曾因得子实行大赦，允许宋使自便还乡，当时许多宋使自称家在淮北，以求侥幸靠近江南，只有朱弁和洪皓、张邵明言家在江南，不图侥幸接受恩赐，不尽使命绝不南归<sup>14)</sup>。朱弁不屈

不挠，金人最后只得不再勉强。

屡次拒绝金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朱弁毫不畏惧。他曾致书洪皓，说生死由于天命，重要的是“舍生以全义”。又曾嘱托当时也在大同的宋使友人，说他“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被杀，请将自己埋葬那里，上写“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如此则为幸矣。面对生死的选择，朱弁的态度是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不过，朱弁还算万幸。他在大同期间，不少金国达官贵人请他为师，以为子弟传授知识，许多人还争相传颂他的作品，并以得到他的作品相夸耀。金人虽为异族，但是并不排斥汉族的文化，对宋使的知识学问也颇为尊敬，因此除了朱弁以外，如洪皓、张邵等留金宋使也都为金人子弟当过教师<sup>15)</sup>。

公元1143年8月，宋金达成和议<sup>16)</sup>，朱弁与洪皓、张邵一同回到临安。回朝以后，朱弁建议宋高宗把握时机，在遵守和议盟约的同时，不忘收复失地的准备；又献上在金国得到的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书画，并将北方10余名忠臣义士的死节事迹上奏，请求朝廷褒奖。高宗感其艰苦忠贞，欲授官职，却遭奸相秦桧作梗，结果只落得直秘阁（相当于文史馆）的闲职。次年4月病逝。

朱弁不曾享受朝廷的恩惠，却以一介“草野诸生”挺身而出，冒死出使敌国，不惧威逼，不受利诱，饱尝孤独寂寞之苦，历经17寒暑而坚贞不屈，“忠义大节，始终凛然”（朱熹语），堪称苏武式的英雄。诚如史家所云：“当建炎、绍兴之际，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节而归，若朱弁、张邵、洪皓，其庶几乎！”<sup>17)</sup>

朱弁除了作过使节之外，还是一位诗人和学者，生前写过很多著作，如《聘游集》、《奏议》、《尚书直解》、《曲洧旧闻》、《续仇骸说》、《杂书》、《风月堂诗话》、《新郑旧诗》、《南归诗文》等等，内容包括诗文、诗话、杂著以及经典解说。他在留金期间也著述不断，如《聘游集》、《曲洧旧闻》和《风月堂诗话》都是当时所著，可惜至今流传下来的完整著作只有后二种。他的诗作在元好问编辑的《中州集》中有若干收录，还有一些作品散见于其他历史文献。

## 2、朱弁与佛教

关于朱弁与佛教的关系，从来无人研究，这里不妨作一探讨。

上文提到，朱弁在碑记的开头，首先就“有为功德”的问题发表了一番议论。在他看来，人们依循菩提达磨对梁武帝的说法而否认有为，实际上佛教的教义必须通过经典来传达，诸佛菩萨境界也要由寺庙来体现，有为不仅可以积累福报，而且可以诱导众生，因此功德无量；达磨提出的只是解救一时弊病的权宜之说，并非真的否认有为功德。关于达磨与梁武帝的对话，原本出自唐代禅僧的杜撰，意在说明皇权扶持下的佛教徒有表面的堂皇，其实缺少真正的宗教性内涵<sup>18)</sup>，后来一般当作禅宗提倡的道由心悟、不在事相的典型说法。宋代以后，禅宗流行各地，即使在北方的金国，佛教也很流行，且以禅宗为盛<sup>19)</sup>，于是此说也广为流传。修复善化寺需要浩大工程，若从修心的观点来说，也属“并无功德”之类。但是朱弁认为，达磨的说法并不适合善化寺的场合，而且有为并非没有功德，从而否定了禅宗信奉的达磨关于造寺度僧并无功德的观点。

尽管禅宗否认有为功德的说法流行甚广，但是持相反看法的也一直大有人在，所以朱弁的观点并不新鲜。问题是他何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有缺，今已不知其详，不过从他晁说之的密切关系来看，不排除他受到后者影响的可能，因为晁说之刚好既信奉佛教，又持有类似的观点。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号景迂，司马光弟子，博学多识，兼长诗画，元丰五年（1082）进士，历任太学教授、中书舍人、徽猷阁待制。曾因上书受到党争牵连，被放逐明州（今浙江宁波）作船场监<sup>20)</sup>。晁家世代为书香门第，且有兼崇儒释的家学传统<sup>21)</sup>。晁说之也是一样，在他被贬明州期间，曾与天台宗僧人明智有过直接交往，并从此倾心天台教法，自称“天台教僧”或“洎上老法华”，后来被《佛祖统纪》列入宋代天台宗明智中立的弟子。政和元年（1111）11月，晁说之受托为明智的祖师四明尊者法智当年得到的赠诗作序，序中说“此我高祖文元公与杨文公（指晁迥与杨亿——引者）之所称叹者”<sup>22)</sup>，足见其清醒的家学传统意识。

晁说之倾心天台和净土，而于禅宗多有批判。例如他曾批评人们对净土信仰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疑而不信”，二是“信而狂且愚”。其中后者“不知

悟心以入观，明因以克果，但言我能心净，孰非净土？”他认为这种看法表面上“似能为维摩之言，而身实天魔之民也”<sup>23)</sup>。众所周知，禅宗推崇维摩诘，主张心净则佛土净。他在这里批评的显然就是禅宗。

此外，晁说之还作有《明智法师碑论》，记述天台宗的传法谱系并说明天台教法的正统性。其中说达磨“在梁时始来东土，于六度中特以禅名，虽云顿示，岂能无方便？虽云不立文字，初传则有《楞伽》。后五六叶则尚《般若》，览教照心，不在兹乎”？就是说禅宗标榜的达磨顿旨，实际上并不能离开经典文字。文中谈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时说：“或曰教外别传，不知教无等等，何外之有？传授圆成，何别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非妄，乃以何者为文字？”就是说佛法圆成，无分内外，文字微妙，禅宗所说“文字”的意义不明，因此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并不成立。最后他干脆直接抨击禅宗，说：“又曰传道益微，言禅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乎器昏，放乎淫荒，吾将合马鸣、龙树之道焉。”<sup>24)</sup>显然，在晁说之看来，禅宗的教法并不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禅宗信徒不过是一些狂妄自大之徒、扰乱佛教的异端。

上述晁说之否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观点，与朱弁肯定有为功德的看法一脉相通。朱弁不仅是晁的学生和侄女婿，而且二人交往密切，意气相投<sup>25)</sup>，他长期跟随晁说之游学，知识学问深深受其影响，在对佛教问题的看法上，殆无例外之理。

朱弁自号“观如居士”<sup>26)</sup>，这个字号本身就显示它的主人深知佛理。关于朱弁与僧人的交往，史传没有记载，但是根据朱弁的碑记，可知他在使金期间绝大部分时光在善化寺内度过。大概朱弁初到金国时期，金人千方百计迫使他屈从变节，但是威逼利诱不见效果，于是将他弃置冷落，结果善化寺成为朱弁的栖息之地。他长期住在善化寺，显然与寺内僧人关系密切。朱弁在碑文中对圆满大师称赞备至，显然不仅熟知其人，而且深怀敬意。另一方面，善化寺僧请朱弁撰写碑记，也表明寺僧对他恭敬有加。关于这一点，清人朱彝尊早已指出：“当其时，宋诸臣留于金若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学自命，顾寺僧独以公之言为足重于世，亦以见恭敬之不可弃，而忠信所行者远也。”<sup>27)</sup>在朱彝尊看来，

寺僧偏偏选中朱弁以为碑记的作者，并不仅仅是因为看重他的文才，而是因为更尊敬他的忠信。如此说来，朱弁与圆满之间，应是惺惺相惜。不仅如此，朱弁嘱托朋友日后将自己埋葬其处的“近郊某寺之地”，朱彝尊认为就是善化寺<sup>28)</sup>。善化寺位于当时大同城的郊外，朱彝尊的推测应当不误。果真如此，则善化寺对于朱弁来说就不仅仅是一时栖身的去处，而且是可以生死相托的所在。当然，后来的结局是朱弁回到了南宋，最终长眠在西湖旁边的上智果院。这个地方虽非善化寺，但毕竟还是佛教寺院，他与佛教确有生死不解之缘。

在这篇碑记作成的前两年，亦即皇统元年（1141），朱弁还写过一篇《台山瑞应记》。文中记述雁门使君侯文彦在五台山见到的奇异光景，并对此类“瑞应”加以解释。朱弁认为，诸佛菩萨与大阿罗汉，由于悲悯众生，经常变现奇异以化导迷情，凡在名山胜地示现的境界，皆为有目共睹，五台山的文殊菩萨也为诱导迷情而以“瑞应”出示方便；昔日世尊曾经身放金光，因为须达乃大檀越（施主），所以佛光先照其家，侯家世代奉佛，于五台山多有施舍，所以文殊菩萨所现奇迹“亦犹世尊之于须达”；张商英曾于元祐年间（1086～1094）游五台山，将他遇到的神奇变异记录下来，为的是化导众生，可是却遭到喜好禅悦之人的诟病，其实张商英既是“黎民所宗仰”的高官，又是“释子所依赖”的外护，侯使君与张商英有着同样的心境，且其所见“瑞应”乃众人共睹，因此必定真实不妄<sup>29)</sup>。通过这篇文字，可知朱弁不仅于佛教中的“瑞应”深信不疑，而且认为此类现象是诸佛菩萨为了引导众生而铺设的方便。在这里，他再一次附着对那些追求禅悦而轻视“事相”的人们作了旁敲侧击。

说到朱弁对于禅的态度，似乎并非一概排斥。例如他在留金期间，有一次得到虞侍郎赠送松皮，朱弁按照北人的办法，将松皮与蔬菜一起进食，感觉“珍美可喜”，于是作诗答谢。诗中“吾老似出家，晚悟愧根钝。滋旨却膾荤，禅悦要亲近。……跏趺得一饱，万事皆可摈。……宴然默不语，草木雷音震。得法于此公，骨髓传心印。应怜持节人，饷此为问讯。欲将无上味，为我洗尘坩。食之不干余，感激在方寸。”<sup>30)</sup>大概朱弁的父亲信奉禅宗，而这位虞侍郎又曾从之学禅得法，所以朱弁由食松皮菜的美味而想到禅悦的清心之乐，从习禅者的角度对虞侍郎表示感谢，其中不禁露出他对禅者的欣赏之情。

除了佛光之类的“瑞应”以外，朱弁还相信定光佛转世的说法。定光佛又名燃灯佛，佛教经典中一般把他作为释迦牟尼佛以前的古佛，说他曾为释迦授记，预言释迦成佛。大约从五代时起，始有定光佛转世普度众生的信念，并有相应的各种传说，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太祖就是定光佛转世<sup>31)</sup>。朱弁的著作里也有多处关于定光佛转世的记载，例如他曾记述一位朋友讲述的对定光佛从不信到信的经历，听罢叙述之后，朱弁说道：“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异也。”<sup>32)</sup>那位朋友最初不相信念诵定光佛的名号可以消灾弭难，当看到朱弁关于定光佛的记述之后，始相信定光佛转世之说。朱弁认为，定光佛初出世和再出世都在丁亥年，这不仅是与真命天子降生相应的“流虹贯日”之瑞应，而且这种年代上的巧合本身也是一大奇异现象。所谓定光佛初出世的丁亥年，是指宋太祖赵匡胤出生的年代（927年）；而定光佛再出世的丁亥年，则是指宋高宗赵构出生的年代（1107年）。宋太祖建立北宋，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宋高宗建立南宋，保住了宋室的半壁江山。在朱弁看来，这两位帝王的降生，都是定光佛转世普度众生、保佑天下太平的具体表现。

上文提到，朱弁回朝后曾将北方10余名忠臣义士的死节事迹上奏朝廷。在他举奏的义士当中，有一位五台山和尚真宝。当金兵占领代州（今山西代县）、对五台山大肆搜索之际，真宝聚兵抵抗，杀伤甚众，被捕之后，敌方百般诱降，真宝不为所动，最后慷慨就义。朱弁将真宝看作忠臣义士，对真宝“外死生，威武莫能屈”的气概以及忠贞不渝的精神怀有深深的敬意<sup>33)</sup>。

综观朱弁与佛教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他与善化寺僧人有过直接的交往，关系密切；二是他对佛教中一般流行的功德、果报、瑞应、境界、转世等说法深信不疑；三是在佛法抉择上推崇天台和净土，而对禅宗心法有所不取，但也不是一概否定；四是他的佛教观点与晁说之的基本一致，或者说他直接受到后者的影响；五是他的佛教信仰与忠君爱国的观念互为表里，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特别尊敬既深信佛教又忠于国君的僧人，以及相信宋太祖和宋高宗为定光佛转世的说法。此外，他的《曲洧旧闻》记录北宋的逸闻故事，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佛教故事，这些逸闻大多得自晁说之的传授，同时也表现了朱弁本人对佛教的关怀。

### 三、朱弁身后的史迹

朱弁去世以后，在他生活过的大同和杭州，有过哪些和他有相关的人物、史实和遗迹呢？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了解这两个地方的历史上与朱弁相关的侧面。

#### 1、宋元时代的冷暖

金大定十六年（1176）朱弁碑建立，然而当时距碑记作成的皇统三年（1143）已有30余年，朱弁本人也早已不在人世。朱弁碑为什么搁置了很久以后才得以刻立，今已无从知晓。

根据朱熹的记载，当朱弁南归6年之后，朱熹才第一次看到他的灵柩和遗著；又过了34年，朱弁的灵柩还停放在智果院，朱熹当时在浙江任职，曾经想为朱弁下葬而未成；当朱熹为朱弁写作《行状》时，尤袤、张杓参与了安葬之事，还有当时的太学录（太学长官之一）张体仁，以占卜方式选定钱塘县（今杭州）的积善峰下作为安葬的墓地<sup>34)</sup>。

朱熹写作《行状》的时间，可据尤袤的经历来推断。尤袤（1127～1193<sup>35)</sup>），字延之，号遂初居士，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和藏书家，又是朱熹的好友。朱在《行状》中提到尤袤当时为密院检详，尤袤担任此职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8月至次年正月<sup>36)</sup>，可见《行状》作于这一期间。

就在同一年，尤袤受朱熹之托为朱弁撰写碑铭，次年3月完成<sup>37)</sup>。后来这篇碑文刻于朱弁的墓碑，直到明清时代的方志还有提及<sup>38)</sup>。遗憾的是，这篇碑文不见于书册记载，朱弁墓碑也不知下落，现在无从得知碑铭的内容。不过，朱熹在收到碑铭以后曾给尤袤回信，信中有如下评语：

志铭之作，雄健高古，曲尽事情，虽或节用《行状》之词，而一经点化，精神迥出。正襟伏读，使人魄动神悚，知君臣之义与生俱生，果非从外得也。窃谓此文实天下名教之指南，寒乡冷族，何幸而独得！<sup>39)</sup>

从这个评语可知尤袤在碑文中记述了朱弁的事迹，又阐发了“君臣之义”，而且文章感人，所以朱熹认为它足以作为名教指南。朱熹提到尤袤文中有对《行

状》的引用，表明尤袤的碑铭写于《行状》之后。一般来说从碑铭写成到刻于墓碑还需要一些时间，因此朱弁墓的最后完成应在《行状》和碑铭作成之后。朱熹在信中还提到他被任命主管云台观之事，此事发生在淳熙十二年（1185）4月<sup>40</sup>），由此可知朱熹的回信写于此后不久。

《行状》中提到的另一人物张杓，字定叟，是宰相张浚之子、湘学宗师张栻之弟，也是朱熹的朋友。张杓多年担任临安知府<sup>41</sup>），所以朱熹把他称为“临安帅守”。关于他为朱弁的下葬提供帮助，南宋末期的黄震（1213～1280）也有记载<sup>42</sup>）。大概张杓当时作为杭州的地方长官，为朱弁的安葬提供了便利。

概括说来，朱熹的《行状》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第二年尤袤写成朱弁碑铭，朱弁的安葬、或者说朱弁墓的完成大致应在这一期间。此时已是朱弁去世40年之后了。朱弁去世前曾经希望归葬故里，但是由于他的子孙贫困无力<sup>43</sup>），于是拖延了如此之久才得以安葬。

到了元代，朱熹六世孙朱圭任庆元路（今浙江宁波）学官，在朱弁墓旁修建了一座“永思堂”<sup>44</sup>），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朱弁祠。又据清代记载，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浙江学官陈大绶曾在朱弁墓前建祠<sup>45</sup>）。陈大绶，字长卿，浮梁（今属江西）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曾任浙江督学，官至福建布政使参议<sup>46</sup>）。不过，陈氏所建朱弁祠，与朱圭所建朱弁祠的地点可能不同。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文再叙。

朱弁生前写过很多诗文，但是他的诗集没有流传下来。大约在金国灭亡前后，诗人元好问（1190～1257）收集金代诗作2千余首，编成《中州集》一书，其中包括朱弁的诗作38首。《中州集》收录的范围本限于金人作品，朱弁是南宋使者，并非金人，但是元好问不拘一格，将朱弁的诗作一并收录，从而使之流传后世，后人得以从中了解他留金期间思乡忧国、孤苦凄凉的心境。

## 2、明清志士的缅怀

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明末清初，或许因为异族入侵、天下剧变给人心留下深深的伤痕以及国破家亡的隐痛，一些熟悉历史的士人见到朱弁的遗迹，不免抚今追昔感慨无尽。就目前所知，当初曾经写过凭吊朱弁作品的有彭孙贻、朱

彝尊、厉鹗、向杰等人。

彭孙贻（1615～1673），字仲谋（一字羿仁），号茗斋，明末贡生，入清不仕，在家奉母，专心著述。他曾有有《拜宋朱少章墓》诗一首：

马上惊题识，披榛拜俨然。

清风樵探绝，遗事史书传。

宿草眠香麝，幽花奠杜鹃。

湖山余恨在，北首望冰天。<sup>47)</sup>

诗中描写作者偶然发现隐蔽在草丛中的朱弁墓，于是下马肃然参拜，在清风瑟瑟、人迹绝踪的墓前，不禁想起史传中墓主生前的故事，觉得草丛之下还有英雄的香气，寂寞开放的花朵祭奠着杜鹃啼血的辛酸，墓主心怀国破家亡的遗恨，望着冰天雪地的北国。彭孙贻生当山河破碎之际，这位既熟悉历史又不肯与满清合作的志士，面对朱弁的墓碑，心中感慨与墓主同然，所谓“湖山余恨”，既是替古人道心事，也是倾诉作者的心声。

上文提到前人曾指出朱弁的碑记别有“志意所在”，此人就是清初著名的学者、诗人和藏书家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曾任翰林院检讨、《明史》编修。自康熙三年至七年（1664～1667），朱彝尊在山西作幕僚，其间曾住大同。他“在山西时常策马纵游，见废墟冢墓碑文，祠堂佛刹碑记，皆广为搜集，以资考证”<sup>48)</sup>，因而不仅到过善化寺，而且为朱弁碑写了一篇跋文，名曰《大同府普恩寺碑跋》<sup>49)</sup>。文中推测朱弁所说的“近郊某寺”就是指普恩寺，并指出普恩寺僧对朱弁独有尊敬，——关于这两点，上文已经提到；此外就是感慨后人未能真正理解朱弁碑记的寓意。那么在朱彝尊看来，朱弁碑记的真正含意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但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他的想法。他在文中提到，朱弁出使金邦，怀印起卧，悲歌慷慨，不辱君命，忠贞不渝，是一位苏武式的英雄；朱弁在当时环境下撰此碑文，“有不得已而为之者”，有些话不能明白道出；后人看重朱弁的文章，但只是从他们自己的眼光去理解，看不出朱弁碑记原有的寓意，于是“大节皎然”的朱弁无法被后世理解。显然，在朱彝尊看来，后人在朱弁碑中没有看出他的“忠信”和“大节”，而这一点正是朱弁碑记中真正寄托的“志意”；朱弁当初在金人的眼皮底下不能直接道破这

层意思，后世之人又不能理解，实在是“不白之冤”！

那么朱彝尊是根据什么看出朱弁的“志意所在”呢？他也没有说明。他生活在满清的统治之下，恐怕也有和朱弁一样的难言之隐。如果沿着朱彝尊的提示仔细观察，不难从朱弁的碑记发现若干伏笔。其中第一个是关于普恩寺“辽末以来，再罹锋烬”的话题，历数寺院遭金兵破坏的状况，看上去只是同情寺院和僧人的遭遇，实则隐含着对金兵的愤慨和谴责。第二个是关于寺僧圆满的话题，作者肯定圆满视“君恩佛恩”为一体的看法，赞扬他为了“成此功德”而不计个人利益、以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精神，表面上只是在赞扬他人，实际上也在表达作者自己不畏艰难、志节不改的决心和立场。第三个是关于普恩寺历史的话题。在碑记的末尾部分，朱弁根据寺内铜钟上清泰三年（936）的款识，推测该寺大约在“石晋之初，或唐亡以后”改名为普恩寺，然后特意叮嘱后人探究改名的原因，并强调这是他和寺众的期待。然而问题是，弄清普恩寺改名的原因真有那么重要吗？他真正期待的难道仅仅是要人了解这么一个细节问题吗？恐怕未必如此。朱弁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人，大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只要提到清泰三年和石晋，自然会让人想起当年一段痛心的历史：

石敬瑭初为后唐河东节度使，废帝清泰三年，移镇郓州，拒命，诏讨之，敬瑭求援于契丹，契丹册立敬瑭，国号晋，尽得后唐故地，以燕云十六州入于契丹，后得蜀金州，又增置威州，有州一百九。<sup>50)</sup>

恰恰就在普恩寺的铜钟铸成的那一年，卖国求荣的石敬瑭（892～942）为了作得儿皇帝，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让给契丹。从此以后兵连祸结，北方大片国土落入辽国，辽灭以后又归于金，最后连北宋王朝也被金人毁灭。清泰三年石晋种下的祸根，带来以后无穷祸患，朱弁真正期待的，应该是要人们牢记这段历史吧。

以上几处伏笔，朱彝尊没有揭破，也许在满清统治的条件下，他的话只能到此为止。但是他已经点明朱弁的碑记还有言外之意，可谓慧眼分明，深识其意。

康熙年间，杭州诗人厉鹗也曾作诗凭吊朱弁。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乾隆元年（1736）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不中，以后终身不仕。他是当时江南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又于辽史独有研究，他曾作有《过宋通问副使朱公少章墓》诗一首：

突兀残碑立古阡，行人犹记绍兴年。  
青衣已见君王辱，白发何期使节旋。  
老泪冰天他日恨，遗闻曲洧至今传。  
一抔筑并花宫地，夕呗晨钟更惘然。<sup>51)</sup>

康熙五十五年（1716），24岁的厉鹗路过朱弁墓地，不禁感慨，于是写下这首诗篇。诗中描写作作者路过朱弁墓地时，看到残留的墓碑，想起当年的往事：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金人废为平民，脱下帝袍换上青衣，朱弁出使金国，白发而归，羁留期间，曾为死去的徽宗撰写哀辞，内有“泪洒冰天”之句，又撰《曲洧旧闻》，一直流传至今；朱弁的英灵就安葬在寺院附近，作者为墓主加上一抔黄土，听着日暮之下寺院里传出的梵呗钟声，心中无尽怅惘<sup>52)</sup>。

此外，清人向杰也有凭吊朱弁的诗一首，题名《朱行人祠》：

苏卿使节已多年，朔漠风高鬓皓然。  
二帝无魂归魏阙，孤臣有泪洒冰天。  
倾葵白日心常赤，横草黄沙志亦坚。  
遗像一龕崇俎豆，芳名应与鄂侯传。<sup>53)</sup>

此诗显然是作者参访朱弁祠后抒发感慨之作。诗中以苏武留胡比喻朱弁使金的经历，描写朱弁在冰天雪地、黄沙漫天的北国心系二帝、忠于朝廷的赤胆忠心，说明他与岳飞同样是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作者向杰（1725～1805），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状元，官大学士。此诗收在《湖山便览》，而《湖山便览》成书于乾隆三十年（1765），故此诗应作于是年之前。

### 3、杭州的朱弁遗迹

在朱弁生活过的大同，善化寺和朱弁碑至今保存完好。那么杭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根据史料记载，杭州历史上与朱弁相关的遗迹主要有白龟池、智果寺、朱弁墓、朱弁祠。

先说白龟池。根据朱熹的《行状》，绍兴十四年（1144）4月6日，朱弁“以疾卒于临安府白龟池之寓舍”，黄震《黄氏日抄》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由此可知，朱弁回到临安以后，住在白龟池附近，直到病逝。白龟池是古代杭州城内的

人工饮水池，水源引自西湖，唐代李泌开凿，后来白居易、苏轼都曾重修，为杭州历史上著名的“钱塘六井”之一，苏轼的《钱塘六井记》中曾有记述。关于它的位置和规模，明清时期的记载说在钱塘门城垣的内侧，面积约有4亩<sup>54</sup>。钱塘门为古杭州城的西城门之一，位于今杭州市内湖滨路与庆春路的交叉口，现有“古钱塘门”石碑以为标志，白龟池和朱弁生前的住所就在附近。如今钱塘门、白龟池均已不在，朱弁寓所更不消说。

再说智果寺。据朱熹记载，朱弁生前曾“遗命归葬故山”，死后未能如愿，故“权厝西湖上智果院”<sup>55</sup>；黄震也说朱弁卒后“厝智果院”<sup>56</sup>。可见朱弁遗骨停放智果寺，当初只是权宜之计，可是直到40年后才得安葬。“上智果院”或“智果院”，也叫作“上智果寺”或“智果寺”，是杭州历史上的著名佛寺之一。然而杭州历史上先后有过多处名为“智果”的寺院，其中关于宋代智果寺的情况，可从下列史料知其大略。

一是北宋智圆的记载：“智果院者，西湖鉴映，孤山屏倚，……建创之岁，即后唐同光三年也。”<sup>57</sup>二是明代吴之鲸的记载：“智果禅寺，旧在孤山，吴越王所建，宋绍兴间徙筑于此。……元末毁。洪武初，僧可祥、惠炬重建，徐一夔作记。”<sup>58</sup>三是明代张岱的记载：“智果寺，旧在孤山，钱武肃王建。宋绍兴间，造四圣观，徙于大佛寺西。……后寺破败。崇祯壬申，有扬州茂才鲍同德字有邻者，来寓寺中，……寺得再葺。时有泉适出寺后，好事者仍名之参寥泉焉。”<sup>59</sup>又：“绍兴十六年建四圣延祥观，尽徙诸院刹及士民之墓。”<sup>60</sup>四是清代梁诗正的记载：“智果禅寺，在葛岭上。《咸淳临安志》：开运元年钱氏建。……绍兴间徙北山，有泉适出，仍名参寥，其梁亦自孤山移置于此。元末毁，明洪武初僧可祥慧炬重建，国朝顺治间重建。”<sup>61</sup>五是清代翟灏、翟瀚的记载：“智果观音院，旧在孤山，晋开运元年吴越王建。宋元祐五年，苏公重建法堂，并题岁月于梁。……绍兴二十年，改充延祥道院，徙葛岭。”<sup>62</sup>又：“上智果禅寺，旧在孤山，名智果观音院。宋绍兴间，分为二：一徙栖霞岭阳，后改忠烈祠；一徙葛岭，标‘上’字别之。”<sup>63</sup>

从上引史料可以了解智果寺的源流变迁。智果寺原在孤山，全称“智果观音院”，始建于后唐同光三年（925），比后代通常说的开运元年（944）还早20年。

北宋苏轼曾与僧人诗友参寥子（道潜）在此交往，并为该寺重建法堂，后代传为佳话。南宋绍兴年间，因宋高宗在孤山兴建四圣延祥观，将山上寺院墓冢悉数迁出，智果寺也在其中。关于智果寺的迁出年代，史料中或谓绍兴十六年（1146），或谓绍兴二十年（1150），然而朱弁去世之后，灵柩停放上智果院，由此情况来看，恐怕在朱弁去世前后，上院已经建成，因此智果寺的迁移应早于史料所记的年代。迁移后的智果寺分为上、下二院，其中下院位于栖霞岭，宋孝宗时岳飞遗骨迁葬于此，后来成为专门奉祀岳飞的祠庙，今日名为“岳庙”。上智果院位于葛岭，自元末以来几经兴废，大概由于下院改为岳庙以后实已不存，上院的“上”字也就失去原来的意义，于是后来改称“智果禅寺”，此名一直沿用下来。如今，智果禅寺遗迹犹存，位于杭州市内葛岭路1号，门楼主体基本完整，寺院房屋大多还在，只是早已改为民居，显得陈旧不堪，据说现存建筑为清代遗留。这里就是上智果寺，当初停放朱弁遗骨的地方。

接下来说朱弁墓。据网络消息，朱弁墓曾于1957年被杭州市政府指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sup>61</sup>。然而遗憾的是，其墓今已荡然无存。为寻找朱弁墓的遗迹，笔者于2007年11月和2008年2月两次赴杭州调查，但是均无所获。按理说，假如朱弁墓真的曾为市级文物，当地应有相关的档案记录，甚至还有知情人在，通过档案记录和实地调查，应该不难确定朱弁墓的位置。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样的调查似有种种不便，于是只得诉诸文献考证。

自宋代以来，关于朱弁墓的地点不乏记载，但是异说纷云，莫衷一是。大而别之，相关记载可分两类：一类是“积善峰说”，另一类是“胭脂岭说”。

属于积善峰说的记载主要有：一是朱熹的《行状》，其中提到当时在尤袤、张杓的协助下安葬朱弁的遗骨，“而太学录张君体仁又为得吉卜于钱塘县积善峰之下”<sup>65</sup>。就是说下葬的地点由张体仁卜定，其地就在钱塘县的积善峰下。二是黄震的《黄氏日抄》卷三六，其中提到朱弁卒后起初安放在智果院，“后张定叟为之迁葬积善峰下”。此说与朱熹的记载大致相同。三是吴自牧的《梦梁录》卷一五：“秘阁朱弁墓，在西湖。”四是明代的记载，如清代雍正年间编修的《浙江通志》卷二三五引《万历杭州府志》说朱弁墓“在智果院后”。五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卷二一七，其中杭州府二云：“朱弁墓，在钱塘县西湖智果

寺后，积善峰下。弁卒……后四十年，其从孙熹官浙中，卜葬积善峯下。”

以上第一至三项为宋代的记载。其中朱熹为朱弁安葬的当事人，他的记载自然最具权威性。朱熹和黄震明言朱弁葬于积善峰下，此一记载相当具体，然而积善峰之名今已消失，又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因此目前无法确定积善峰到底是今日杭州的哪座山。不过，朱熹提到“钱塘县积善峰”，意味着积善峰在钱塘县。宋代钱塘县毗邻临安府城，包括西湖周边一带，积善峰就在这一范围。吴自牧说朱弁墓“在西湖”，显然是说在西湖附近。将宋代记载综合起来，可以说朱弁墓在钱塘县西湖附近的积善峰下。

以上第四、五项为明清时期的记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积善峰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在智果院（寺）后”的说法，从而使关于朱弁墓位置的说明更加具体。将其概括起来，可以说朱弁墓在钱塘县西湖附近积善峰下智果寺后。这种记载符合朱熹以来积善峰说的大前提，因而较为可信；但是由于没有说明究竟是哪一座智果寺，所以还是留下疑问。这里所说的智果寺，如果是指记录的当时、亦即明清时代的智果寺，那么由于当时杭州城外附近只有上智果寺或智果禅寺，因此只能是指葛岭智果寺；如果是指南宋时代的智果寺，那么在朱弁下葬的当时（1185），孤山智果院早已不在，而栖霞岭的下智果院也因改为岳飞祠庙而于20年前（1165）更名“褒忠祠”，于是西湖附近的智果寺只有葛岭一处，而且这座寺院自南宋以来一直存在，因此这里所说的智果寺非葛岭莫属。与此相应，假如“在智果寺后”的记载确有实据，那么积善峰也就是葛岭，因为葛岭上智果寺的位置不曾有变。不过，笔者于2008年2月20日曾到智果禅寺后面调查，未能发现朱弁墓的遗迹。另外，葛岭已见于宋代记载<sup>66)</sup>，它与积善峰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再看属于胭脂岭说的记载。此类记载包括在九里松、仙芝岭、胭脂岭等多种大同小异的说法：一是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卷一〇：“九里松旁，旧有……朱弁墓，并废。……朱弁墓，弁，徽州人，绍兴初授官，副王伦使虏，见执，……后归，卒，葬于此。”二是清代《浙江通志》卷二一七“朱行人祠”的注文引孙谷《通问副使朱公祠记》的记载：“宋秘阁朱公，讳弁，……副王伦使金，留十七年，……时以和议成，与洪皓、张邵俱归，卒，葬钱塘九里松仙芝岭

下。”三是清代梁诗正的《西湖志纂》卷八：“弁以建炎元年，副王伦使金，拘留十七年，仗节不屈，和议成，放归，卒，葬仙芝岭下。”四是清代翟灏、翟瀚的记载：“弁以建炎元年，副王伦使金，拘留十七年，仗节不屈，和议成，放归，卒，葬胭脂岭下，地为其从孙晦庵先生所卜。”<sup>67)</sup>

以上诸说出均为明清时期的记载。其中第一项说朱弁墓在九里松旁，第二、三项说朱弁葬于仙芝岭下，第四项说朱弁葬于胭脂岭下。九里松为杭州市内自洪春桥通往灵隐寺、天竺寺方向的林阴道路，唐代开元年间，在当时的杭州刺史袁仁敬住持下，于道路两旁各植松树3行，绵延9里，因此得名。《西湖游览志》的作者田汝成（1503～1557）是杭州本地出身，不知他的朱弁墓在九里松旁之说依据何在。此说既不同于积善峰或智果寺说，也不同于胭脂岭或仙芝岭说，比较特殊。不过，由于九里松与胭脂岭的方位大体一致，所以此说亦可归入胭脂岭说。至于仙芝岭和胭脂岭，二者名虽有异，实则为一。西湖史料中多有这两个山名的记载，其实都指同一地方<sup>68)</sup>，其中以《湖山便览》卷五的记载最为清楚：

胭脂岭，在九里松西南，其地土石独红，因名。今以胭脂音近，致讹称仙芝岭。又以普福寺在其上，称普福岭。下有仙芝泉，通小溪，经茅家埠入湖。<sup>69)</sup>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胭脂岭”和“仙芝岭”互为别称，因为山上原有普福寺，所以还有“普福岭”的别名，此山就在茅家埠的附近。茅家埠的地名至今未改，所谓朱弁墓在胭脂岭，也就意味着在茅家埠附近的山下。

那么胭脂岭说的记载是否可信呢？如果这些记载依据可靠的资料，或经过作者的亲证，那么自然可信；但如果是沿袭错误的记载，或者源于道听途说，那就值得怀疑。在上引记载中，明显存有可疑之点。首先，《浙江通志》关于朱弁墓的记载自相矛盾，其中卷二三五引《万历杭州府志》说朱弁墓在智果院后，而卷二一七又说朱弁葬于仙芝岭下。智果院在葛岭，与仙芝岭（胭脂岭）风马牛不相及，同一书中相反之说并存，二者必有一伪，而《浙江通志》未作甄别。其次，在上引《湖山便览》的记载中，自“弁以建炎元年”至“葬胭脂岭下”一段，与《西湖志纂》卷八的相关记载几乎全同。之所以如此，要么是二者之间互相抄袭，要么是二者同样照搬了另一史料的记载。而且《湖山便览》更有甚者，作者在这

段记录之后，又画蛇添足追加了一句“地为其从孙晦庵先生所卜”，此说与朱熹关于张体仁“卜于钱塘县积善峰之下”的记载明显相背，从而暴露了作者既不曾对朱弁墓作过实地调查，也没有充分把握以往的史料记载。如此看来，明清时期的记载确有不少破绽，须要谨慎对待。不过，既然前人有此一说，那么在得到档案记录或遗迹实物的证实之前，不妨暂且留作备案。

最后说朱弁祠。在杭州历史上，可能曾有多次朱弁祠的修建，目前见于记载的有元代朱圭修建的永思堂和明代陈大绶修建的朱行人祠。从相关记载来看，这两个朱弁祠似乎并非一事。“永思堂”的记载见于《浙江通志》，其中先引《万历杭州府志》说朱弁墓在智果院后，然后引《成化杭州府志》说朱弁卒后40年，朱熹卜葬积善峰下，后来朱圭作永思堂于其侧<sup>70)</sup>。按此说法，永思堂应在积善峰下智果寺后朱弁墓的附近。“朱行人祠”的记载也见于《浙江通志》，其中先引《钱塘县志》说“在九里松”，然后引孙谷《通问副使朱公祠记》说朱弁卒后葬九里松仙芝岭下，后来“浮梁陈公大授来督两浙学，表彰忠义，卜地普福寺北天医院左构祠”<sup>71)</sup>。如此说来，朱行人祠在普福寺北，亦即胭脂岭的附近。此外，《西湖志纂》说“朱行人祠，在九里松”，又说朱弁“葬仙芝岭下。万历三十八年，提学金事陈大绶建祠，春秋致祭”，然后又引《钱塘县志》说“祠久废”<sup>72)</sup>。就是说朱行人祠在九里松，朱弁墓在胭脂岭下。与此相近的记载还有《湖山便览》卷五的“朱行人祠”条，其中说朱弁“葬胭脂岭下，地为其从孙晦庵先生所卜。明万历时，提学金事陈大绶就墓前建祠”<sup>73)</sup>。就是说朱弁墓在胭脂岭下朱弁墓前。据上述记载可见，永思堂为元代朱圭所建，位于积善峰下智果寺后朱弁墓旁，朱行人祠为明代陈大绶所建，位于九里松胭脂岭下朱弁墓附近，二者并非一事。

史料记载中的两个朱弁祠，其修建人、构筑时间、所在地点都不一样，但是都在朱弁墓附近。如果两种记载均为属实，那就意味着杭州历史上曾有两处朱弁墓、祠，即一处在葛岭智果寺，一处在九里松胭脂岭。但是历史上真的会有两处吗？或者说杭州历史上曾有朱弁墓、祠的迁移吗？就通常情理而言，恐怕并无迁移的必要，从史料记载来看，也没有迁移的证据，因此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如果两种记载一个属实、一个谬误，那么究竟孰真孰谬？对于这个问题，目前不宜轻下断语，在单凭文献考证无法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还有待于档案记录或遗迹调查

的证实；不过，目前仅从文献记载来看，由于智果寺说符合积善峰说的大前提，而明清以来的记载多有破绽，因此朱弁墓、祠在葛岭智果寺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笔者在智果寺调查时发现，寺后山坡上有一片长方形平地，地面光秃，与长满草木的周围地带不同，假如朱弁墓、祠真的曾在智果寺后，其位置或许就在这里。而且，厉鹗当年曾在朱弁墓前听到“夕呗晨钟”，可见墓地就在寺院附近，其寺或即智果院乎？当然，究竟如何，还需要调查。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即朱弁的墓、祠不在一处，也就是说朱弁墓在葛岭，朱弁祠在胭脂岭。关于这种可能，可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洪尚之先生的看法作为答案：

关于朱弁祠，参照西湖上古今名人祠墓的情况，基本上凡有墓有祠者两者皆在一地，前祠后墓或左祠右墓，未闻有祠、墓分处的（有也只见墓在湖上而祠在市区的）。至于朱祠的兴建时间、次数，已比较清楚，而位置却同样不能确指，问题还是出在积善峰究竟在哪里。至于据现今智果寺遗构所在的地形地貌和环境，未必就能确定不曾有祠的建造。南宋与朱弁事迹相似的洪皓，歿后也曾先葬于葛岭（大致在今岳庙东侧、杭州饭店西部一带）并建“洪忠宣祠”，另外智果寺旁的陈文龙墓，至少在清代墓前曾建过祠。湖上祠的规模，未必会很大，有时仅为一小间飧堂，便称之为祠了。<sup>74)</sup>

洪先生举出同类事例以为参照，足供参考。根据他的分析，可以排除朱弁墓、祠分开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那么朱弁的墓、祠或在葛岭，或在胭脂岭，二者必居其一。

## 结语

朱弁生前，他在当初留金的宋使中羁留时间最长，志节最为慷慨，但是在历尽艰辛回朝以后，“忠义之声”并不那么显赫<sup>75)</sup>，而且还遭奸臣压抑。朱弁身后，他在后人的记忆中只是时隐时现，身后衰荣与生前付出远不相应，他的名声与他生活过的善化寺一样，似乎常被世人冷落。但世俗的眼光并不能抹去朱弁的光彩，他是宁死不屈的好汉、可歌可泣的英雄。庄严的大同善化寺，朱弁遗文历

历犹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朱弁英灵默默长眠，名胜古迹，水色山光，皆由英雄气概而得灵气。古来多少朱弁那样的英雄遭冷落、被遗忘，他们的身上虽无光环，但是在光环之外别有异彩，他们也是“中国的脊梁”。

## 【注】

- 1) 据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编《朱弁碑贴》(2002年大同市内部印制)抄录。
- 2) 《辽史》卷二八，天祚帝本纪二。
- 3) 《辽史》卷二九，天祚帝本纪三。
- 4)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 5) 参见《金史》卷九〇。
- 6) 同上。
- 7) 金代有无鲁县，目前尚不清楚。此处所说鲁县，很可能为古县名，其地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参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25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北京）。
- 8)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
- 9) 《山东通志》卷一五之一。
- 10) 以下简称《行状》。此文收在《朱文公文集》卷九八，《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52～45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上海。
- 11) 朱弁本传见于《宋史》卷三七三。
- 12) 关于朱弁的生年，未见于史料记载，有的资料作1085年（参见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第2023页“朱弁”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天津），不知何据。
- 13) 大约10年之后，朱弁曾在诗中提到“往年避难大隗山”之事（参见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诗》上册，第146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太原）。
- 14) 参见《宋史》卷三七三洪皓和张邵的传记。洪、张二人于建炎三年（1129）分别使金，被金人扣留。
- 15) 同上。
- 16) 参见《宋史》高宗本纪。
- 17) 《宋史》卷三七三传论。
- 18) 参见拙著《中国禅宗的地方性》，《禅宗与“禅学热”》第243～24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北京。
- 19) 宇文懋昭《金国制》“浮屠”条：“浮屠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说郛三种》第2册，第1188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海）。
- 20) 关于晁说之的经历，参见《佛祖统纪》卷一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晁明旺《宋

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晁氏宗亲网<http://www.sytianqi.com>)等。

- 21) 据《宋史》卷六四，晁说之的先祖晁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师傅致，为一家之言”。
- 22) 《晁待制作纪赠法智大师诗序》，《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
- 23) [宋]晁说之《净土略因》，《乐邦文类》卷四。
- 24) 本段引文均出自《明智法师碑论》，见《佛祖统纪》卷五〇。
- 25) 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八存有和朱弁诗若干首，其中之一云：“喜就三冬学，仍开橘林蚕。星霜吴地客，风雨郑人鸡。逸兴逢蓬留，高怀绝石梯。五言何富丽，种玉不论畦”(《次朱少章韵》)。应为歌颂二人情谊之作。
- 26) 参见朱弁《风月堂诗话序》。
- 27) [清]朱彝尊《大同府普恩寺碑跋》，《曝书亭集》卷五一。
- 28) 同上。
- 29) 参见《续清凉传》卷下，《大正藏》第51册，第1133页b~c。
- 30) 《全辽金诗》上册，第147页。
- 31) 参见林国平《定光古佛探索》，《圆光佛学学报》第3期，第223~240页，1999年2月。
- 32) 《曲洧旧闻》卷八“予书定光佛事”条。
- 33) 参见朱弁《上朱昭等忠义奏疏》，[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四，奏疏。
- 34) 参见朱熹《奉使直裰阁宋公行状》，《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56~4557页。
- 35) 关于尤袤的生卒年有多种说法，本文姑从吴洪泽《尤袤年谱》之说。
- 36) 参见吴洪泽《尤袤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9册，第596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成都。
- 37) 参见上书第5964、5966页。
- 38) 《浙江通志》卷二三五引《万历杭州府志》说朱弁墓“在智果院后，尤文简公袤作铭”。
- 39) [宋]朱熹《答尤尚书》，《晦庵续集》卷三。
- 40) 淳熙十二年4月，朱熹受命主管华州(今陕西华县)云台观(参见[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三，《朱子全书》第27册第295页)。云台观在华山，实际上朱熹并未到任。
- 41) 参见《宋史》卷三六一本传。
- 42) 参见[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六。
- 43) 据朱熹说，朱弁死后“藁殡西湖之智果院三十年矣。其孙照者，贫悴亡聊，不能归葬故里，今欲只就左近卜地以葬”(《晦庵续集》卷三)。
- 44) 《浙江通志》卷二三五引《成化杭州府志》：“熹六世孙庆元路学录圭作永思堂于其侧”。
- 45) 参见[清]梁诗正《西湖志纂》卷八、[清]翟灏、翟瀚《湖山便览》卷五。
- 46) 参见《江西通志》卷九〇、《续文献通考》卷一七〇。

- 47) 《茗斋集》茗斋诗五言律。
- 48) 参见《朱彝尊年谱》，国学论坛网 [www.guoxue.com/minrennianpu](http://www.guoxue.com/minrennianpu)。
- 49) 此文收在《曝书亭集》卷五一。
- 50) 《续通典》卷一二三。
- 51)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一。
- 52) 关于此诗的解说，可参见吴伯娅《“诗魔”厉鹗》(《清史论丛》，2006年，<http://www.qingstudy.com>)。
- 53) [清]翟灏、翟瀚《湖山便览》第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杭州。
- 54) [清]梁诗正《西湖志纂》卷七：“白龟池，在钱塘门内城下。《西湖游览志》袤广四亩许，池底通西湖。”
- 55) [宋]朱熹《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56页。
- 56)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六。
- 57) [宋]智圆《钱唐孤山智果院结大界序》，《闲居编》卷三一(《卍续藏经》第101册，第43页下，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台北)。
- 58) [明]吴之鲸《武林梵志》第104页，杭州出版社，2006年，杭州。
- 59) [明]张岱《西湖梦寻》卷一(《四库全书》电子本)。
- 60) 同上书，卷三。
- 61) [清]梁诗正《西湖志纂》卷七。
- 62) [清]翟灏、翟瀚《湖山便览》第47页。
- 63) 同上书，第93页。
- 64) 参见《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杭州网 <http://www.hangzhou.gov.cn>。
- 65) 《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57页。引文中“钱塘”二字原缺，《浙江通志》卷二三五引《成化杭州府志》作“卜葬钱塘县积善峰下”，今据以补。
- 66)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一：“葛岭，在西湖之西，葛仙翁炼丹于此，有初阳台。”
- 67) 《湖山便览》第121页。
- 68)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一：“胭脂岭，在九里松曲院路西。”[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〇：“(自九里松一一引者)折而南，为仙芝岭、普福讲寺、葛翁井。”又：“仙芝岭，俗称胭脂岭。”[清]梁诗正《西湖志纂》卷八：“仙芝岭，在九里松南。”又：“普福寺，在胭脂岭。”
- 69) 《湖山便览》第121页。
- 70) 参见《浙江通志》卷二三五“宋秘阁朱弁墓”条。
- 71) 《浙江通志》卷二一七。
- 72) [清]梁诗正《西湖志纂》卷八。

从大同善化寺到杭州智果寺

73) [清] 翟灏、翟瀚《湖山便览》第121页。

74) 引自洪尚之先生2008年3月5日给笔者的复信。

75) 《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同时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还，而忠义之声于天下者，独皓而已。”